

酷儿理论等于同性恋研究吗？

都岚岚

摘要: 酷儿理论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于妇女研究领域的一种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它与同性恋研究既有一定的渊源,又有反拨它的地方,而国内学界倾向于将酷儿理论等同于同性恋研究。本文旨在通过评述酷儿理论的理论渊源与内涵,探讨它与同性恋研究之间的差异,以期国内学术界进一步了解酷儿理论。

关键词: 酷儿理论; 同性恋研究; 后结构女性主义; 朱迪斯·巴特勒; 伊芙·塞吉维克

作者简介: 都岚岚,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批评。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朱迪斯·巴特勒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研究”[项目编号:12CWW005]的成果之一。电子邮箱: dulanlan@sjtu.edu.cn

Title: Is Queer Theory Equal to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Abstract: Queer theory is a field of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al theory that emerged in the early 1990s out of women's studies. Although it is related to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it differs from and reacts to them. Since Chinese scholars tend to conflate queer theory with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this essay hopes for a more accurate introduction of queer theory with an analysis of its main ideas.

Keywords: queer theory;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m; Judith Butler; Eve Sedgwick

Author: Du Lanl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n feminist theory and criticism. Email: dulanlan@sjtu.edu.cn

酷儿理论(Queer Theory) ^①将后结构主义理论与对性少数群体的压迫这一社会问题相结合,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社会批判理论。从 1969 年 6 月 27 日“石墙”同性恋酒吧引发抗议性的暴动以来,美国学术界开始冷静思考同性恋遭到非人待遇这一社会问题,对性政治进行研究的理论兴趣越来越浓厚。1989 年,加州大学桑塔克鲁斯分校教授特里萨·德·劳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在同性恋性欲研究的会议发言中首次使用“酷儿”一词。1991 年,劳丽蒂斯为《差异》杂志编辑了专辑“酷儿理论: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的性”。酷儿理论因此正式得名。由此可以看到,酷儿理论的确与同性恋研究有密不可分的联

系。但是,从国内学者对酷儿理论的阐述来看,存在将两者等同起来的现象。例如,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系列教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第六章将酷儿理论等同于 LGBT 研究,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及跨性研究(魏天真 梅兰 116)。“简析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酷儿理论”一文的作者认为,“进入 90 年代,男女同性恋研究逐渐合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酷儿理论”(傅淑琴 李洪 212)。问题是:酷儿理论果真是同性恋研究吗?可以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吗?下面将通过阐述同性恋研究与酷儿理论的主要关注点来回答上述问题,理清两者的关系,从而让国内学术界更为准确地把握酷儿理论这一新兴

的理论模式。

一、同性恋研究的理论旨趣

在日常生活中,一提起某某是同性恋,人们往往会对他/她表示鄙视、厌恶,认为同性恋是变态。在异性恋为规范的社会里,同性恋一般处于非公开的秘密状态之中,^②不敢公开其另类的性取向,因为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是受排斥和打压的群体。作为一个描述性的类别,同性恋给人的印象是病态、有罪、违反社会道德的,是异性恋社会中魔鬼般的幽灵,因而受到政府、教堂、医院等社会机构的管制和压迫。普遍存在的恐同情绪使得同性恋群体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甚至遭到暴力的威胁。根据美国第11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报告:1984年美国感染HIV者为40—45万人,其中62%是因同性恋行为而感染的男性,20%为吸毒者(许新东8)。里根政府因此对性问题采取保守的政治策略,在政治、经济、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同性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压制。另类的性取向导致许多性少数群体丧失了社会权利,在各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人身安全遭到憎恨同性恋的极端分子的威胁。这种状况逐渐引起性少数群体的抗争。早期的同性恋群体正是基于同性恋这一共同的身份,采取行动主义的态度,谋求更为公正的待遇。

早期的同性恋研究主要的理论关注点是:同性恋这一性倾向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这一问题构成同性恋研究中关于本质主义和建构论的论争。持本质主义观点的一方认为,同性恋的性倾向是先天、固定、无法改变的,它独立于文化,是一个人内在的特点。持建构论观点的一方则认为,同性恋这一性倾向的形成与社会、家庭等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不同的社会环境所赋予同性恋的文化内涵不尽相同。这一派别的支持者强调同性恋以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为载体,认为是文化影响了同性恋的形成。争取同性恋权益的行动主义者采纳本质主义的观点来获取社会的认可,而具有恐同情绪的一方则认同建构论的观点,认为如果同性恋这一性倾向是后天形成的,就意味着它是可以得到纠正和改变的。无论哪一种观点占上风,早期的同性恋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质疑“男人”“女人”这样的普遍性概念以及“异性恋”和

“同性恋”这样的两分结构,而是在异性恋霸权的预设下,为作为性少数群体的同性恋争取权益。他们基于同性恋这一共同的身份,抵抗主流社会观念对他们的妖魔化,在政治、经济、职场、法律等领域争取平等的权益。

男同性恋研究的理论家如艾伦·博雷(Alan Bray)、D·A·米勒(D. A. Miller)、艾德·科恩(Ed Cohen)、理查德·德拉莫若(Richard Dellamora)等人注重研究男同性恋在历史和文化中如何通过“丑闻的知识型”(Groden 413)得以表述,对他们的猎奇与厌恶心理如何在现代社会的严密监管和诊断之下得到宣泄,从而说明恐同情绪如何系统性地压制男同性恋的性欲主体。相比较于男同性恋研究而言,女同性恋研究产生的背景较为复杂:它产生于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男同性恋的解放运动等多种社会运动。从事女同性恋研究的一般都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如阿德里那·里奇(Adrienne Rich)、奥德瑞·罗德(Audre Lorde)、莫妮卡·威提格(Monique Wittig)等等。她们不满异性恋的女权主义者,也不满争取同性恋权益运动中男同性恋的性别歧视现象,主张采取分离主义的立场,认为与其说女同性恋是一种性欲身份,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身份;只有放弃异性恋性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男人至上的性别主义观念。不管怎样,在酷儿理论产生以前,男、女同性恋研究都是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之下思索同性恋受压迫的原因,都基于同性恋这一稳定的身份进行政治诉求,寻求改变现状的办法。

二、酷儿理论的理论渊源

早期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一直是在异性恋模式的预设之下,思考女性所受压迫的解决办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的后学思潮不断质疑启蒙主义宏大叙述的普遍性和一统性,冲击着以现代性为基础的西方女性主义第一、第二次浪潮。受后学思潮影响的女性主义理论质疑启蒙现代性的宏大叙述和稳定的“人”的主体性概念,强调以多元化来颠覆现代性概念的稳定性。部分女性主义者开始反对女性主义内部长期以来以白人女性和异性恋为中心的状况,主张尽量包容处于边缘地位的多种声音。同时,西方尤其是

美国争取同性恋权益的社会运动日渐高涨。在此背景下,主张用性的多元话语来扰乱异性恋霸权的酷儿理论应运而生。酷儿理论推崇多样性,反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对同性恋的预设,否定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严格划分,认为性别认同与性倾向具有表演性、流动性和开放性。对于酷儿理论而言,身份不是稳定的范畴,而是局部的、流动的、多重的、开放的。这种有别于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的新型理论正是后学思潮的产物。此外,酷儿理论家拥护“酷儿”一词所代表的不确定性^③,他们无意对其做出清楚的界定,这也与他们后现代思潮的接受有很大关系。

酷儿理论的主要分析范畴是性欲(sexuality),它对性欲的理解主要源于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米歇尔·福柯的观点。后结构主义者不同于结构主义前辈的地方在于,他们摈弃了结构主义的简化主义方法论,认为文本深处存在一个统摄一切的客观、封闭的结构是错误的。对文本进行阐释的任务不在于寻找代表终极意义的普遍结构,而在于探寻该普遍结构之所以成为绝对的中心的缘由。结构主义虽引入关系、差异等概念,但仍然抱定一个中心;后结构主义则旨在消解中心,因为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不管中心的概念如何牢固,如何深入人的无意识之中,它“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关系的产物,无限结构之网中的一项”(马海良 60)。福柯使用“知识型”这一术语替代“结构”,认为那些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各种话语规则并不是普遍和不变的,它们都将随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并且只对特定时期的话语实践有效。例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同性恋的命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古希腊社会男子间的同性欲望是在政治秩序中代表自己的一种方式,因而并未受到压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同性恋则被视作疾病,遭到强制性的治疗。不同时期和国家对同性恋的态度与该时期那个国家的话语建构有密切的关系。酷儿理论吸收福柯的观点,认为性欲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性欲的历史就是关于主体的历史,其意义和内容随着历史时期发生变化。

福柯认为,权力控制语言符号,使其在恰当的时刻创造出所谓的真理和价值,并将它们表达为普遍的、永恒的超验存在。知识主要通过排除手段占据文化支配地位:它们将符合规范的话语类型说成符合自然规律的存在,把规范之外的一切

差异贬为十恶不赦的异端,通过学校、教会、监狱等机构进行压制和剿灭。现代社会中启蒙的理性神话一直试图用“求同”的虚妄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和差异性。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其实是建构出来的,在当中有许多不同权力关系的博弈,胜出的一方控制着知识和话语的生产。福柯关注的是某些被言说而成为知识,某些被排斥而成为异端的条件。他采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从各个方面对现代的控制形式作了深入研究,包括病理学、医学、监狱和性学等等。得益于福柯的思想,酷儿理论并不要讨论谁是同性恋,而是要探寻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成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异端。可以说,酷儿理论既是后结构主义思想与同性恋这一社会问题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修正其理论盲点的结果。酷儿理论属于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

三、酷儿理论的理论景观

与其说酷儿理论主要阐释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所受到的压制,不如说它旨在揭示异性恋霸权如何作为真理体制塑造人们的欲望。谁在宣称或决定什么是规范,什么是不符合规范的酷儿,这是酷儿理论家们所关注的问题。下面将讨论两位具有代表性的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伊芙·塞吉维克(Eve Sedgwick)如何吸收后学思潮,建构酷儿理论的图景。

美国当前学术界最有名的酷儿理论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朱迪斯·巴特勒试图从边缘人的角度探寻规范之所以成为规范,支配什么是可理解的生活、什么是不可理解的生活的条件。她的具体做法是质询诸如身份、性、性别、妇女、物质等基础性的、看似无争议的概念,通过追溯这些概念的历史发展,揭示本质化的概念所造成的认知暴力。

秉承后学思想,巴特勒质疑了稳定的身份的概念,这与其持有不同于传统意识哲学的主体观有着直接的关联。意识哲学的主体观认为,存在一个先在、自足的主体。这个主体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可以进行道德深思,发挥自由意志,并做出自我决定。这种主体观认为本源具有优先性、

决定性和控制性,而表象则只能派生和从属于本源。在这种主体观念下,起源、理念、意识、本真等概念成为霸权性词语,为臣属和层级关系设立了哲学基础。巴特勒追随福柯,深信笛卡尔式的自足、先在的主体并不存在,相反,主体在历史中形成,是建构的产物。

巴特勒对主体构成的系谱学探讨,始于对性别身份的思考,这不仅因为巴特勒认为,我们通常用性别来区分身体,而且她还认为,在性别化过程以前或之后并没有一个本源的主体,主体恰恰产生于这个性别化的过程中。为了说明这一观点,在1990年的代表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中,巴特勒提出了著名的性别操演理论(Theory of Gender Performativity)。^④简而言之,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强调三点:一、性别不是一种存有,而是一种行为,这是性别操演的戏剧维度。二、性别身份的形成不是人们可以自由控制、有意为之的行为,而是在不断重复性别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因而一定需要时间的演进。这是性别操演的仪式维度。三、规范和话语生成性别化的主体,生产关于性别的现实,这是性别操演的语言维度。对巴特勒而言,操演性是一种引用性实践,通过这种实践,话语产生它所命名的效果。而对规范的重复以仪式性的方式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构成主体。与人道主义的主体概念不同,巴特勒认为主体不是一个事先预设的、本质化的实体,而是流动的、过程中的范畴。她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先在的生理性别,我们认为我们自身有某种“本质”的性别特质,这其实是社会规范不断作用于我们身体的结果。因此在巴特勒看来,生理性别并不是先于社会话语存在的事实,它和社会性别一样,都是话语建构的结果。这种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都是在话语的框架内形成的观点将生理性别从自然化的表象中解放出来,为寻求颠覆和置换那些支持男性霸权的自然化的性别概念提供了可能性。

人类的性取向本是多元的,为了繁衍的需要,异性恋模式被自然化、优等化。巴特勒继承福柯的理论,试图消解异性恋霸权这一中心。社会性别的层级结构以统合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之间的一致性为基础而得以建立。为了建立性别的统一性,首先需要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一个人如果在生理上是女性,那么她就应该展现她的“女性特质”,并在异

性恋为规范的模式下渴望男人的爱。也就是说,以异性恋模式为主导的父权制社会只允许男性与女性两种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存在,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决定其社会性别和欲望取向。为了揭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之间不匹配和非稳定的状态,巴特勒援引福柯《性史》第一卷中阴阳人赫酷林·巴宾的故事,来说明有关性别身份的单义性结构是为了服务于社会对性欲的管理和控制而生产的。

巴宾的身体同时具备解剖学上男性和女性的元素,无法归类于任何一种可理解的性别身份中。巴宾刚出生时性别被判断为“女性”,她/他二十岁出头时由于爱上一位叫萨拉的女性,在对医生和神父的一系列告白后,有关当局让她/他在法律上改为“男性”,穿着男装,行使男人在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权利。巴宾的日记记载了最后给她/他带来自杀结局的一种永恒的危机感。对此巴特勒说“在赫酷林身上,生产可理解的性别化的自我的语言成规发现了自己的局限性,因为支配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规则,在她/他身上汇聚又瓦解。赫酷林调用并重新分配了二元体系的组项,而这样的重新分配扰乱了那些组项,造成它们的增衍而超出了那个二元体系”(Butler, *Gender Trouble* 31)。巴宾的身体特征并不在性别范畴之外,而是搅乱并重新分配组合了这些范畴的构成因素。她/他的身体在解剖学意义上的不连贯性,为展示汇聚于她/他身上的令人不安的异性情欲与同性情欲提供了一个场域,揭露了性的不同属性依附于一个持久的实在基础的虚幻性质。用巴特勒的话说,她/他的身体“是一种符号,代表了单义性别的司法话语所产生的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Butler, *Gender Trouble* 127)。而巴宾的性欲也逾越了社会性别规范的实践,因为她/他曾试图篡夺男人的“名号”,爱上温柔顺从的萨拉。她/他所引起的性别烦扰说明一个持久不变的实在或是性别化的自我的表象是文化对性别进行管制而生产出来的。无法将巴宾归入任何个性别范畴,这正说明了性别范畴的不稳定性,也说明以异性恋规范为主导的社会必定会将巴宾打入贱斥者的领域。

性别的单义性建构掩盖了各种不同的性功能,将它们人为地统一起来。生理性别以原因的姿态出现在以异性恋规范为主的话语里,告诉人

们生理性别是性欲望和性经验的基础,目的在于方便异性恋规范对性经验进行管制。巴特勒早期的几部著作从哲学层面说明:为了建立“适宜”的主体性,社会要求驱逐不适宜、不清洁和无秩序的成分。为了建立异性恋规范,非规范的性实践被视为社会禁忌和污染源,成为克里斯蒂娃所说的贱斥物,被直截了当地打入“他者”之列。纵观历史,文化规范在社会主体的认同中不断地设定同性恋等边缘性社会的存在,将其视为可怕的社会死亡对象,赶入道德和律法合围而成的领地进行压制。异性恋文化霸权的各种话语不断向我们灌输规范之外的性少数群体为我们带来的种种危害,使我们心生恐惧,逐渐排斥、歧视甚至伤害他们。酷儿理论就是要挑战这种以异性恋为基础的性别等级秩序,认为人的社会性别身份是多重的、游移不定的,个人的性行为和情感选择有可能出现流动性或非连续性,也就是说性别身份是不稳定的、多元的,并且在社会与政治冲突中不断演变。在《消解性别》中巴特勒指出,不应该仅将酷儿理论理解为“反对所有的身份主张,包括稳定的性别分配,酷儿理论更应反对对身份进行多余的规定,而不仅仅只是假设身份的可塑性”(Butler, *Undoing Gender* 7)。

巴特勒在深刻指出权力话语对欲望的压制和生成的同时,认为性别和欲望灵活多变,性别是欲望的化妆表演。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身体属性,而是文化规范对我们身体的物质化过程中的表征。为了对抗性别的单义建构,扬弃性别是身体快感原初原因,巴特勒视“性别”为权力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她对单义性“性别”的解构为释放多元性欲打开了可能性的领域。巴特勒的酷儿理论拒绝本质主义,相信性别没有对错和真假,也没有原初和衍生之分。关键是去行动,去重复,不断越界,从而质疑和颠覆原有的自然化的性别机制。

巴特勒提出性别操演理论是为了使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欲、身份等范畴去自然化,重新对这些范畴进行意指。如果主体的构成性特征意味着它永远是一种非固定的过程,那么就可能有重新意指和改变的可能性,抵抗就不是不可能之事。能动性就在于主体的非稳定之中,因此操演性的主体性具有一种解放力量。性别操演理论揭露传统价值观中某些关于性别身份的霸权话语,为建立更加多元和谐的人类社会做出理论构想。巴特

勒对操演性身份的理论建构已成为理解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伊芙·塞吉维克是与巴特勒齐名的酷儿理论家。她的代表作《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以下简称《男人之间》)(1985年)和《衣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1990年)被公认为性/性别研究领域具原创性和突破性的作品,也是人文学科领域极其重要的基础性读本。在《男人之间》的引言中,塞吉维克指出该书旨在“探寻塑造性的方式,探寻哪些东西可以算作性,而这两方面都依赖于并影响了历史上的权力关系”(Sedgwick 7)。在该书中,塞吉维克提出一个区别于“男同性恋”的重要概念,即“男性同性社会欲望”,认为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同性社会欲望”指男性个体之间的社会纽带,它与“男同性恋”这一概念相分离,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而“女性同性社会欲望”与“女同性恋”之间存在连续性,两者经常被认为是同一回事。塞吉维克从社会、经济及权力关系的角度,通过对一些英国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分析形成上述不对称现象的原因,认为男女同性社会欲望的历史差异是持续的男女权力关系不平等的表现。塞吉维克指出,异性恋这一传统结构与同性恋之间存在博弈关系,传统异性恋的结构是以女性作为交易媒介的男子之间互惠的关系,恐同是以异性恋霸权为规范的父权制度的必然结果,或者说,父权从结构上要求恐同情绪存在。因此不应将恐同情绪仅仅视为是对同性恋的压迫,而要意识到恐同情绪是控制整个性别系统的工具。她认为,针对男性和女性的恐同都不是任意的或无缘无故的,而是紧密交织于家庭、性别、年龄、阶级以及种族构成的轴线中。如果不改变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我们社会中的恐同情绪就不会停止。塞吉维克的《男人之间》以性为主要议题,弥补了诸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传统女性主义理论中欠缺关于性的讨论的现象。她将性这一分析范畴放到了一个显著的、质询的位置,试图对女性主义研究做出反恐同的贡献。

在《衣柜认识论》中,塞吉维克讨论了同性恋研究中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的论争问题。以往的同性恋研究认为同性恋的性倾向是天生的、无法改变的,因而也是本质主义的。这种理解成为

同性恋争取政治诉求的灵丹妙药,因为如此一来,同性恋天生的性倾向就会成为博得同情和斗争的砝码,可以免受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的谴责。但塞吉维克指出,生物决定论无法成为政治斗争的庇护地,因为“那些掌握我们文化的政治和认识论高度的人首先试图改变的是生物上已知的一些事实”(Turner 130)。由于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论都从病原学的角度讨论同性恋产生的根源,这只会导致社会对同性恋“操控性的幻想”,因此,塞吉维克用少数化/普遍化(minoritizing/universalizing)替换了本质主义/社会建构这一对术语。少数化的观点认为对同性恋的界定仅对非常态性身份的群体产生效用;持普遍化观点的人认为对同性恋的压制关乎整个异性恋文化的形成。塞吉维克支持后一阵营的观点,注重揭示同性恋身份在异性恋权力/知识体制中的构成性作用。少数化/普遍化这一对新的术语避免了本质主义/社会建构论的僵局,使其从对同性恋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纠结中转向分析同性恋如何成为异性恋霸权结构的构成性他者。

此外如书名所示,塞吉维克认为,“衣柜”这一意象代表了同性恋对其身份认同艰难的抉择:是选择待在黑暗的衣柜里缄默不语,还是选择出柜,勇敢承受异性恋社会异样的目光,挑战其道德规范,这是每一个非常态性身份的人所面临的心灵上的困扰。沉默也是一种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的述行性效果便是逐渐接受和内化主流社会的性别观,视自己的性倾向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罪过。这种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产生的根源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恐同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形成是长期以来异性恋霸权的各种体制、话语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塞吉维克看来,反恐同的工程必须将政治、范畴、再现和阅读联系起来,因为单一的政治、文化和智性的行动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由于性别话语存在于哲学、文学、影视等各种文本中,批判性的阅读便成为实现激进的政治理想的必要条件。

虽然酷儿理论无法保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不管怎样,以巴特勒和塞吉维克为代表的酷儿理论欢迎和赞赏一幅更宽广的性与社会多样性的图景中的差异,对性别的自然化建构予以批判,是一种具有很强颠覆性的理论。

四、超越性欲范畴的酷儿理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酷儿理论虽起源于同性恋研究,但却不能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酷儿理论的兴起说明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人等性少数群体的研究发生研究方法上的转变。早期的同性恋研究仍然认同异性恋与同性恋的两分结构,强调以稳定的身份政治为基础,为受压迫的性少数群体争取话语权。酷儿理论则否认中心与边缘的两分法,认为“干净明了”的划分有压迫性。身份不是整齐划一、干净明了的;身份的连贯性及稳定性不过是文化上的一种幻象。酷儿理论试图突破身份政治的禁锢,强调酷儿身份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准确地讲,“酷儿”涵盖所有被权力边缘化的人们。如果说劳丽蒂斯在《差异》专辑用“酷儿”指代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理论学者大卫·哈尔柏林(David Halperin)则认为酷儿可以定义为“一切与规范、合法、主导相悖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指涉物,它是一种没有本质的身份。因此‘酷儿’相对于规范划分出的不是一个实在的事物,而是一种立场”(Halperin 62)。他认为,由于“酷儿”没有固定的指涉物,任何试图对“酷儿”进行定义的尝试都是在限制酷儿理论的潜力。酷儿理论是开放的,展现无限“可能性的区域”(Edelman 114)。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酷儿理论虽起源于对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的研究,但它并不只局限于此,目前它已发展成为挑战一切压制性规范的理论的总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酷儿”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酷儿”是一个多种可能性之地,它抵抗任何稳定的模式,强调处于非主流地位的身份的不连贯性。我们也无法将某些对酷儿理论的精彩论述简单地置于性别与性的维度之下,因为这些论述还涉及种族、族裔、后殖民的民族性等问题。酷儿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其概念的流动性、意义的多样性、身份的开放性以及它与性别、种族、阶级、宗教等社会标识的叠覆。

可见,酷儿理论的研究对象虽然一开始是处于文化边缘的性少数群体,但随着酷儿理论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吸收,酷儿理论已成为有别于同性恋研究的一种新兴的理论模式。

结 语

酷儿理论起源于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LGBT)的文化研究,从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潮汲取营养,在性别、性、身体、权力、身份等层面思考多元化与社会多样性,为挑战异性恋文化霸权,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模式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当代性别理论不可缺少的一个分支。而且,“酷儿”已成为一个伞状词语,可以涵盖所有在文化上处于边缘的个体,使他们形成政治上的联盟,因此酷儿理论已经不再局限于研究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的问题,它与种族、阶级等轴线相交叉,试图在尊重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创造更为公正和平等的社会。酷儿理论对主体性等概念持非本质的、灵活的立场,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具包容性,因此笔者认为,酷儿理论值得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和准确的研究。

注释[Notes]

- ① 关于 queer theory 的翻译,王宁、王逢振采取意译的方法,将其译为“怪异理论”,强调其“怪”和“异”的特点,李银河采取音译的方法,将其译为“酷儿理论”,强调酷儿自信、自我认可的含义,与该理论的含义更加契合,因而本文采用李银河的译法。
- ② 同性恋研究形象地称之为“橱柜”状态。同性恋正是通过保持沉默和不可见来获取暂时的安全感。
- ③ “酷儿”原是对同性恋的贬义称呼。在今天的美国,经过长期的斗争,人们对同性恋越来越宽容,某些地方允许同性婚姻的存在。尽管如此,当今世界对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的偏见依然存在,由偏见和歧视产生的恐同情绪所造成的侵犯同性恋合法权益、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使得越来越多的性少数群体积极投入争取合法权益的运动之中。在运动中他们自称“酷儿”,使其对同性恋的贬义指称逐渐转化为自我认可和赞许的含义。可见“酷儿”一词经历了历史的演变,具有多义性:它既可泛指某人的性格、行为奇怪、古怪、不同寻常;又可以特指同性恋,是指称其病态、变态的贬义称呼;还可以指同性恋的自我肯定。“酷儿”一词不稳定的含义增加了酷儿理论的不确定性。
- ④ 关于性别操演理论的主要观点,详见都岚岚,“西方文论关键词:性别操演理论”,《外国文学》5(2011):120-28。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 *Undoing Gen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Edelman, Lee. *Homographesis: Essays in Gay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Groden, Michael, et al.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2012.
- Halperin, David. *Saint Foucault: Toward a Gay Hagiography*. Oxford: Oxford UP, 1995.
- Jagose, Annamarie.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6.
- Morland, Iain and Annabelle Willox, eds. *Queer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Patrick, Dilley. “Queer Theory: Under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2. 5(1999): 457-72.
- Rousseau, G. S. “Foucault and the Fortunes of Queer Theory.” *The European Legacy*. 5. 3 (2000): 401-13.
- Sedgwick, Eve K.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 of California P, 1990.
- Turner, William B. *A Genealogy of Queer The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P, 2000.
- 傅淑琴 李洪 “简析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酷儿理论”,《时代文学》5(2009):212-13。
- [Fu, Shuqin, and Li Hong. “Queer Theory as a Method of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ture of the Age (Shidai Wenxue)* 5(2009):212-13.]
- 马海良 “后结构主义”,《外国文学》6(2003):59-64。
- [Ma, Hailiang. “Poststructuralism.” *Foreign Literature*, 6(2003):59-64.]
- 魏天真 梅兰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
- [Wei, Tianzhen and Mei Lan.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2011.]
- 许新东 “美国艾滋病的现状及防治策略”,《性学》1(1997):8-17。
- [Xu, Xindong. “Present Status of Spread of AIDS and its Control in USA.” *Sexology*, 1(1997):8-17.]

(责任编辑:王嘉军)